

◀ (上接 7 版)

这也意味着,儒家崇尚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泛化,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宋使者的观察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令人伤痛的“以夷变夏”

1141 年签订的“绍兴和议”对于宋朝人来说无疑是丧权辱国的,前往金朝称臣纳贡的使者途经沦丧的中原故土,眼见陷于胡虏的遗黎,其惭愧哀痛可想而知。宋光宗时代(1189-1194)的诗人姜特立,其父在靖康年间殉难,当他一踏上中原大地,丧父之恨、亡国之

亦益少”。回程的路上经过相州,夜宿城外安阳驿,驾车人向他控诉说:“我见父母说生计人口都被他坏了,我辈只唤他作贼。应河南、河北钱物都般向里去,更存活不得。”第二年,范成大出使经过开封,他全文抄录了海陵王所设交钞所的钞文,并评论说,这是金朝实行的一种残酷盘剥河南地区的殖民政策,为的是“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揽轡录》)。意在说明金人并不把黄河以南地区当作自己的国土,他们时刻都在为重回北方老家做着准备。这似乎已经成为南宋士人的普遍认识。1193 年(宋绍熙四年,金明昌三年)使金的许及之诗云:“辇却民财积上京,民贫政自不关情。”(《涉斋集》卷 17《夺玉石桥》)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尤其是熙宗、海陵王、世宗时代,礼仪制度迅速汉化,但也夹杂一

范成大所见所感“以夷变夏”的状况比之楼钥更加严重,故都东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相国寺依旧繁华,寺榜虽然还是宋徽宗御书,而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在相州,道边民众见使者“往往垂涕嗟嘖,老姬跪拜者尤多,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可见其身作为中华之人的历史记忆已经遥远模糊。至邯郸,见城墙之外有居民以长竿挑一白狗,又以一竿缚茅草浸酒,上面有揭条,人们告诉他,这本是女真人祭天禳病之俗,如今则为汉人效法(《揽轡录》)。到淳熙四年(1177),使者周焯已经感到,淮河两岸“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清波杂志》卷 3“朔北气候”条)。金宋以淮河为境,本是人为划定,其南北皆中国大地,但分离半个世纪之后,已使人觉得两国之分界竟也如天设地造一样。

透过使者的眼睛,我们不难

族文化相互“涵化”的结果,辽、金文化是一种既有别于原北族文化又有别于原中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而南宋使者们对这一文化涵化现象的厌恶、恐惧和排斥告诉我们,宋人“华夷之辨”所欲严辨之“夷”,并非是与“中华”处处适相对立的“古之夷狄”,而是杂糅华夷、兼容胡汉、颇类“中华”的“今之夷狄”,比较起来,宋使对没有受到多少汉化的“夷狄”如初兴的女真反而有所欣赏赞美。“今之夷狄”以他们那种貌似“中国文化”的杂交文化改窜、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还具备了僭夺、取代原有“中国文化”的态势,从而会使真正的“中国文化”彻底消失。这种忧患恐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宋人的“华夷之辨”要表达的不仅是民族危机而且是很深刻的文化危机,这也是宋以前的“华夷之辨”所没有的内容。

两宋“华夷之辨”的峻急、

金朝后期的儒士如赵秉文在“正统”问题上与南宋道学家看法完全相同,认为判别中国之“正统”的标准既不是具体的地域也不是种族,而在于是否以“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宣称曰汉,汉者,公天之言也。自余则否。”(《闲闲老人滹水文集》卷 14《蜀汉正名论》)如此一来,金朝、南宋双方都借着把“中国”抽象化、义理化,而宣称对“中国”的独占。而这个北朝的“中国”意识是不能以“民族主义”、“国族观念”来定义的。

葛兆光教授在其影响甚大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认为,宋代具有近代国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及其“中国”意识,乃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头和基础(25-26 页,中华书局,2011 年)。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源头或可追溯于宋代,但宋代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却并非历史上“中国”意识的主流,更不是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乃至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并不就是宋朝那种强调同质性、转向内向化的“中国”,“中国”意识更不可以被宋朝那种有着现代国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意识所垄断。有人曾告诉朱熹,金朝进士所作之赋“气脉厚”,朱熹说:“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朱子语类》卷 109)身为鲜卑族后裔的元好问在金亡后编撰了《中州集》,其中收录了不同民族、地域的诗人及其作品,有由宋入金的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有由辽入金的王枢,有出于渤海大族的王庭筠、高宪,有女真人完颜璘、完颜从郁、石抹世勤、有契丹人耶律履,还有使金被扣的宋人司马朴、滕茂实、朱弁,这样的“中州”反映了金朝多种民族、多元文化混杂交融的状况。由宋入元的遗民家铉翁感叹道:

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并世之人……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

元好问的“中州”似乎已在呼唤、预示一个包容广大、多种异质性并存的“大中国”的出现。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金张璪《文姬归汉图》 资料图片

痛一下子被生生唤醒,成了切身感受:“中原旧事成新恨,添得归来两鬓霜。”(《梅山续稿》卷一《使北二首》)这句诗说出了七十年间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共同的痛苦体验。在这样的局势下,使者们通过亲身见闻指出,所谓的“大金”乃是一个僭窃中原、虏待我民的政权,它并没有把中原真正当作自己的家园,而是对中原、汉族实行剥夺和镇压。这种观察和书写,确实暴露了金朝一直相当严重的民族矛盾,但南宋士人在仇恨情绪下的“偏见”也很明显。

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十月使金,时金世宗大定九年。金世宗即位之后,一面为了挽救中原女真族的腐败,发动复兴女真文化的运动,一面极力提倡儒家,兴学养士,实行对宋和好政策,积极恢复生产,缓和民族矛盾。“大定之治”三十年被称为金朝的盛世,中原人民誉金世宗为“小尧舜”,名声传到了南宋,朱熹曾加以议论。但楼钥在《北行日记》中则主要反映了汉族吏民对金朝的极度怨恨。楼钥一行在前往开封途中遇到运载交子的车辆向北行驶,他说这是“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路途中见运送车辆。河南之民甚贫,钱

些民族特色,这在使者看来,则是中华礼乐已经被夷狄从内部篡改,失去其纯正本色,他们哀叹,在中原大地上已经很难找到中华文化了。为了弄清金人和议的条件,洪皓之子洪适于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出使金朝,当他途经保州(今河北保定),一早醒来,听到城头鸣角之声,顿觉怪异,不禁叹道:“已把哀笳变清角,可伤任昧杂韶英。”(《盘洲文集》卷 5《次韵保州闻角》)乾道六年(1170)来到金朝的范成大发现“虏乐悉变中华”,当他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招待宴会上终于观赏到“京师旧乐工”演奏的北宋乐舞《高平曲》,不禁感慨万分:“老来未忍看婆舞,犹倚黄钟衮六么。”(《石湖居士文集》卷 13《真定舞》)

最让使者感到伤痛、恐惧的,还并不是夷狄强效华风而终不近似,而是中原人民已习染胡俗,逐渐同化于夷狄。华、夷之间如此双向的浸染混合,最终将使整个中原尽成“异域”,我族皆变“北人”。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变质”的中原文化。楼钥见到在开封接待使者的承应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北行日记》)。

看到,中原大地在一百余年漫长的时间里多民族杂居、融合,并在融合中产生了新的一体化趋势,这已导致原来的中原文化有所变容,北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南方的“中国文化”。

怎样认识 10 至 13 世纪的中国文化?

10 至 13 世纪,是中华世界又一次分裂和重组的大时代。在辽、金统治区域下的士人眼中,宋朝是“南朝”,辽、金是有着与宋朝争正统之资格的“北朝”。尤其是金朝,经世宗、章宗时期的大兴文教,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制度、风俗、儒学、文艺,能“自立于唐宋之间”,且有了在文化上与宋相抗衡的自觉意识。而时至今日,我们犹自觉不自觉地以宋朝人的自我意识来认识和想象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以宋朝文化等同于 10-13 世纪的中国文化,那种以“唐宋变革”来概括这一时代历史变化的说法多少反映了这一成见。

正如很多学者认识到的,辽、金文化的形成难以“汉化”概括之,而是中原文化与北

“中国”意识的强化正好说明还另有一种北朝的“中国”意识的存在,并对之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与北宋对峙的辽朝已具有较强烈的“中国”意识。据学者研究,兴宗以后,契丹自称“中国”已明确见诸文献和墓志碑刻,兴宗重熙七年曾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道宗以后,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更是频繁出现。辽道宗(1055—1101 年在位)的言行特别能说明契丹统治者已以“中国”自居,表现出在文化上的自信。据《松漠纪闻》记载,一汉臣为道宗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则不敢讲,道宗说:“上世獯鬻、桀纣,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当讲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说:“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统治中原百年的金朝更是不断地运用各种政治、文化手段来宣称自己已取代宋朝成为“中国”,“德运”和“正统”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自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朝廷开始讨论金朝之德运,至宣宗贞佑四年(1216)方告结束。泰和二年(1202)十月,颁布诏令以金为土德继宋,同时罢修《辽史》。